

陕西考古不断丰富历史图景

孙周勇

考古中国

核心阅读

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之所在，史迹遗存极为丰富，重要考古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内涵。神木石峁、高陵杨官寨等遗址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中意义重大

公元1092年，金石学家、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吕大临以“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为目的，编撰了《考古图》一书，著录古器物200余件，并逐器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登记容量、重量等信息。书中所录器物多注意器物共存关系，其中出土地可考者计90余器，而出自陕西境内者就占半数以上。虽然吕大临所定器名及考释尚有可商之处，但其著录方式与现代博物馆和考古学中的文物信息登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为后世金石学著录树立了研究范式。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距离吕大临著《考古图》已过去829年。

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之所在，史迹遗存极为丰富，是名符其实的考古大省。经过几代人多年的科学考古，令人惊喜的重要发现在陕西层出不穷，这里不但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而且丰富了历史时期的脉络与枝叶。

斗鸡台遗址发掘 奠定现代田野考古行业规范

陕西考古学会是陕西考古学史上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文物调查、文物保护以及田野发掘的机构，主导了陕西境内第一次科学考古活动——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

从1934年至1937年，斗鸡台经历了3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徐旭生领导下的考古队员创新性地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以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确立了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基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奠定了现代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的行业规范。这次发掘使湮没数千年的周秦文化在黄土中重现，造就了苏秉琦等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等研究成果，也促成了考古类型学这一重要考古研究方法的诞生。

斗鸡台发掘和研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和现代考古学研究的经典范例，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陕西发轫。

此外，陕西境内开展的一系列早期考古活动，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考古调查、发



掘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延续至今。例如，1938年对张萼墓等汉中地区文物古迹的调查和发掘；1941年至1945年，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对陕西地区汉唐帝陵、古寺、摩崖石刻等艺术文物的实地考察。1942年，为寻找并确认文献记载的周代都城，考古学家石璋如等对传说中的郿、郿、洋、镐等地进行调查，其中岐阳堡一带的调查报告《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奠定了西周都邑考古的基石。

从半坡到兵马俑 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生产活动及大规模基建中不断发现文物古迹，三秦大地也不例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在陕西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发掘，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村、华县元君庙、西乡李家村等对于构建史前文化谱系具有重大价值的遗址横空出世。

1953年春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建立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半坡模式。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年至1957年先后进行了5次大

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收获如此丰富的资料。新中国第一座史前聚落遗址博物馆在发掘现场建立，考古成果得以直接展示给公众，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迅速开展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史前和高周时期遗址。西周丰镐遗址、秦雍城、秦咸阳城、汉唐长安城、乾陵陪葬墓、耀州窑等考古发掘，为建立陕西历史时期考古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

丰京和镐京并称“丰镐”，是西周王朝的国都，也是中国最早期的城市典范。考古学家初步确立了丰镐遗址的区域分布范围、年代和性质，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与建筑区、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多处贵族墓地和青铜器窖藏。对丰镐遗址古环境、古地貌、古水系及聚落内部布局演变的研究持续展开。

上世纪60至70年代，何家村窖藏、章怀太子墓、临潼姜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周原铜器窖藏等一批重要发现更是举世关注。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震惊世界，千人千面、生动写实的陶俑所组成的秦始皇地下军团扑面而来，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秦

陵考古。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对外开放，兵马俑、铜车马等秦文明符号从此驰名中外。持续至今的秦陵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隋唐灞桥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重大研究课题项目 延伸历史轴线丰富历史细节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沔阳河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周原是西周王朝形成及发展的关键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凤雏三号基址是迄今发掘最大规模的西周单体建筑遗存。特别是基址庭院内的立石、铺石遗迹，据文献资料推测，可能为一处“社祀”遗存。自2006年展开的西汉帝陵考古，为探寻证实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繁荣文化遗产事业，增强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2019年9月，陕西考古博物馆破土动工。博物馆集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为一体，通过陕西案例，讲述中国考古千年酝酿、百年发展的历程。作为全国首座系统展示区域考古史、方法理念和重要发现的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计划在2021年内对外开放，努力践行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图①：西安长安唐韩休墓壁画。
图②：高陵杨官寨出土蟠龙彩陶盆。
图③：西安咸阳机场二期出土十六国吹笙乐俑。
图④：宝鸡石鼓山出土青铜牺尊。
版式设计：赵德汝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分布浙江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早期遗存距今1万年前后，考古发现了房址、柱洞、红烧土面、灰坑等反映定居生活的遗迹，疑似收获工具的镃形石刀，用以砍伐和加工木材的石镑和石凿。红烧土残块中发现大量炭化稻壳，通过浮选发现了炭化稻米，从陶片断面上观察到陶土中掺有稻壳，可以推测，稻已经成为当时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

以上发现揭示，上山文化先民已经开始实施某些耕种行为，例如通过砍伐和焚烧植被开辟田地、播撒稻种、定居管理稻田、待稻成熟后使用特定工具收获，等等。如是，稻作农业起源或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

农业起源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某些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赖逐渐加强，最终这些植物和动物进化成为必须依靠人的帮助才能进行正常再繁殖的特殊物种，即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而人类社会也相应地演变成必须依靠农作物和家畜家禽为基本生活资料来源的技术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骤然变革。这个过程以稻作农业最为典型。

稻作农业起源过程历经数千年之久，大约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人类开始定居并耕种稻，标志着稻作农业的出现；直至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社会经济主体，标志着稻作农业社会正式形成。

距今8000年前后是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目前考古发现的属于这一阶段的相关遗址有：湖南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浙江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和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的舞阳贾湖遗址和邓州八里岗遗址等。在这些遗址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水稻遗存。另外，开展过系统浮选的遗址还出土了稗草、飘拂草、荃蒿等常见稻田杂草。杂草是以人工生境为生长环境的特殊植物群体，其中的田间杂草与人类耕种的农作物相伴而生，因此遗址出土的田间杂草可以间接反映农业生产情况。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考古遗址还普遍出土了野生动物遗骸和植物遗存。例如在贾湖遗址发现了数不胜数的鱼骨，以及鹿、牛、兔等野生动物遗骸，浮选出土了菱角、莲藕、板栗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显示，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出土的水稻遗存并不具备明显优势。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经济主体仍然是采集狩猎（渔猎），水稻种植和家畜饲养仅仅是辅助性的，生业形态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处在稻作农业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早期阶段。

距今7000至6000年间仍处于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演变过程中。属于这个阶段的考古遗址数量较多，其中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最具代表性。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出土了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数量惊人的水稻遗存，也包括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菱角、芡实、莲子、板栗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田螺山遗址几个储藏坑内家畜中出土的板栗。作为淀粉类食物，板栗与稻谷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收获季节、食用方式、营养成分、储藏功能等，所以对人类而言，这两类食物是可替换的，如果其中一类能够得到充分供应，就没有必要获取另一类。板栗含有苦甙的单一、脱离工艺复杂，所含蛋白质和纤维也比较粗糙，口感差，不易消化，因此人类如果能够收获足够的稻谷，就没有必要采集板栗为食。大量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特别是板栗储藏坑的发现说明：虽然稻作农业生产在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古代先民的生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收获的稻谷不足以养活村落居民，仍然需要通过采集获取野生植物资源。

直到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主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与早期考古学文化相比较，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考古遗址数量突然剧增，环太湖区域特别是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曾发生了一次人口大幅增长。在人类发展史中，人口增长速度受到基本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调控和制约，如果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所以，良渚文化时期人口增长的现象应与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只有依靠相对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考古还揭示了一座宏伟的良渚古城和一个距今5000年前的区域性古代社会群体，它能够常年征调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无关的建筑工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农耕生产的劳动效率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仅需要部分成员从事稻作农耕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中国稻作农业历经数千年演变，逐步形成了特有的稻作农业体系，包括水稻耕种技术、节气和历法、谷物加工方式和蒸饭饮食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因而，从中国古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可以看出，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是一脉相承的。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一脉相承

赵志军

传承之光

展现传统音乐的艺术魅力

王蕊蕊

相同，如《好事近》：个别变曲曲牌连续顺序与元曲几乎完全一致，如《滚绣球》《醉太平》。管子、笛、笙、云锣和堂鼓，是智化寺京音乐所用的基本乐器。这样的乐器组合形式，源于汉代军乐鼓吹。南宋瓦肆中出现了“清乐”组合，以笙、笛、箫、方响（即云锣）、拍板等乐器组成。至明代，宫廷朝会乐、宴乐使用的丹陛大乐、进膳乐、太平清乐等编制，则与智化寺的笙管乐基本一致。智化寺京音乐所用管子仍保留着前7孔、后2孔的宋代形制。所用笙为17簧，其中有两支“义管”为需要转调时临时换装，这也是宋制。这几件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合而成的乐队可谓轻便实用，各乐器既相互照应又各自发挥所长，既围绕着主旋律又避免齐奏，逡巡追逐，和而不同，演绎出辉煌盛大、庄重典雅的中国古代“交响乐”气派。

智化寺京音乐采用传统的工尺谱，最早的存世曲谱为清康熙三十三年智化寺第十五代艺僧容乾所抄的《音乐腔谱》，另有清道光、光绪等时期的抄谱共12本。每本抄谱字体规整，曲数庞大，字里行间透着每一代传人对音乐传统的严谨。抄写工尺谱是为了记录

保存，也便于学习和授徒。由于工尺谱只记录骨干音和“板”，那些骨干音之间的连接音（称为“阿口”）只能靠口传。“韵谱”是每一位传人的基本功，师徒共执谱本，一板一眼、一字一句地教唱，直到把工尺谱烂熟于心，才可脱谱演奏。传世的12本抄谱共记录了笙管乐曲牌200余首，传至第二十六代传承人时，仅余42首可以演奏，格外珍贵。胡庆学等5名第二十七代传承人是1991年来到智化寺学艺的。他们坚持学习了5年。师父对他们督促得紧，先韵谱、后演奏，一首接一首逐个背过。师父要求姿势端正，用丹田之气，口风要正。“难学易忘少人知”，他们对师父的这句话深有感触。正是他们的韵味和演奏，让今人能够听到500年前明代宫廷音乐的声响。乐声穿越五百年。第二十七代传承人成为馆里的全职乐师，每天上午10点、下午3点准时演奏并讲解相关知识，很多观众慕名前来欣赏。智化寺京音乐这一古老的音乐文化遗产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展现着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图为智化寺京音乐乐器及工尺谱抄本。



文化遗产